

构建中国武术自主理论话语体系的基本维度研究

陈保学^{1,2}, 陈保磊³

(1. 西安交通大学 人文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49; 2.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终南山武术研究中心, 陕西 西安 710071;
3. 中国计量大学 体育军事部, 浙江 杭州 310018)

【摘要】: 新文化运动以来, 中国武术理论的演进深受西方体育学的影响。历经一个多世纪的发展, 最终形成了以西方体育理论为标准的中国武术理论话语范式, 而中国武术自主理论话语体系尚未形成。在面向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征程中, 如何建构中国武术自主理论话语体系, 业已成为亟需解答的时代命题。解答这一时代命题, 实现这一学术理想, 须有坚持批判性“察古自镜”的历史经验, 深化本源性“基础理论”的立论基石, 加快创新性“范式转换”的内生动力, 坚守人民性“中国立场”的根本遵循, 拓展开放性“国际视野”的活力源泉。当代中国武术学者应深刻把握新时代发展机遇, 在学科理论发展上要有前瞻的眼光和变革的信心, 大胆跳出定式思维, 在不断探索实践、借鉴吸收、革故鼎新、融合发展等方面下功夫, 强化自主理论话语体系。唯此, 中国武术自主理论话语体系的构建才能不断焕发新的生命力, 真正成为一种深具“中国属性”的话语参照。

【关键词】: 中国武术; 体育理论; 人民性; 武术理论体系; 文化自信

【中图分类号】: G85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2096-5656(2024)06-0071-09

DOI: 10.15877/j.cnki.nsic.20250107.001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了“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三大体系)的重大指示。新时代体育学科要实现高质量发展, 也亟须完善三大体系及其相关学科理论作为支撑^[1]。在此背景下, 如何完善作为一种中国式学科的武术理论话语体系, 成为摆在武术研究者面前的又一重大选题。回顾中国武术从传统走向现代^[2]的历史进程, 虽然在竞技武术、学校武术、群众武术等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就, 但武术理论话语体系的研究工作却一直处于边缘位置。基于此, 研究提出“构建中国武术自主理论话语体系的基本维度”, 探讨如何构建才能彰显其突出性的中国式学科特征, 以及通过哪些维度展开构建才能凸显其自主性、本土性、独立性等。所谓中国武术自主理论话语体系, 是指将中国武术的相关核心概念、基础理论、文化内涵、精神价值等方面的内容, 通过自主性的理论构建和话语表达, 形成一套系统、完整且具有中国特色的武术理论体系。

梳理近代以来中国武术理论发展的演进过程,

总结、提炼其重要的历史经验, 重新思考并深入探讨构建中国武术自主理论话语体系的基本维度。要实现中国武术自主理论话语体系的构建, 至少应从历史经验、立论基石、内生动力、根本遵循、活力源泉等5个维度展开。第一, 应从历史经验出发开始构建, 以“不忘本来”的态度展开批判性“察古自镜”; 第二, 应有深厚的基础理论作为构建的立论基石, 基础理论不深则体系塔基不牢; 第三, 应将创新性范式转换作为构建的内生动力, 只有不断创新和转换才能顺应时代、符合当下、关涉未来; 第四, 应始终保持人民性的中国立场这一根本遵循, 开展构建工作, 中国立场是基本立场, 是彰显自主性、保持独立性的根本原则; 第五, 应有开放性的国际视野为构建提

收稿日期: 2024-10-20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24BTY105); 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23Q005);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基本科研业务费资助项目(KYFZ24064)。

第一作者: 陈保学(1980—), 男, 山东济宁人, 博士生, 副教授, 硕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 武术文化与发展。

通信作者: 陈保磊(1986—), 男, 山东济宁人, 博士, 副教授, 研究方向: 武术文化与发展。

供活力源泉,只有胸怀国际视野才能与其他文明展开交流互鉴,才能更好地“吸收外来”。察古自镜是前提条件,理论基础是立足点,范式转换是推动力,中国立场是根本保障,国际视野是必经之路。

1 坚持批判性“察古自镜”:构建中国武术自主理论话语体系的历史经验

历史地看,近代以来中国武术理论发展历经了探索、奠基、自觉等重要阶段,而这些阶段所形成的历史经验,为中国武术理论话语体系构建带来了重要的实践启示。所以,以批判性的历史视角回顾、梳理和分析中国武术理论的演进历程,则是当下建立中国武术自主理论话语体系的必要前提。

1.1 “以西为镜、以体为鉴”的中国武术理论探索经验

鸦片战争失败以后,“西学东渐”成为当时的一种社会思潮,包括体育在内的多种西方文化样式强势传入中国,并逐步影响到文化制度、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等各领域,中国固有之文化面临着失去主体地位的危机。有鉴于此,诸多文化精英挺身而出,坚持捍卫民族文化之根基,一时间中西文化间的争辩此起彼伏。此刻,变革与存亡联系在了一起,“能变则存”“不变则亡”,最终学习西方“以变图强”的主张优势胜出^[3]。而由此引发的“新旧体育之争”与“土洋体育之争”,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武术理论的发展^[4]。近代初期,参与新旧、中西体育争论的近代知识分子们,将中国曾经的辉煌和近代的落后与身体上的强壮和羸弱相类比,形成了“东亚病夫”的身体隐喻,不仅映射着国民“茶弱”的身体状态,更喻指中华民族的落寞与沉沦^[5]。面对民族之隐忧,严复呼吁“鼓民力”,梁启超提倡“尚武精神”,谭嗣同则提出“反静主动论”等理论号召,他们无不希望通过“不忘武事”、通过“身体之强”来增强民众之力、民族之力,实现强国之愿望。这种愿望在知识分子的感召下,逐渐被纳入“国家意志”,奠定了“军国民教育”思潮的基础。受此思潮的影响,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西方兵操被引入军事学校中,将技击与兵操相结合,武术兵操化初步形成。之后,国民政府将体操与武术进一步结合^[6],推行“中华新武术”,并于1918年成为全国正式体操。同年,《中华新武术》中的拳脚、棍术、剑术、摔跤等分类成科,并由商

务印书馆出版,正式成为学校教科书。新文化运动的爆发以后,各种欧美理论思想接踵而来,自然主义体育思想^[7]也被引入。伴随着军国民思想的式微,新的体育思潮应运而生,中国武术理论也开启了其“体育化”演变的历史进程。尤其是1922年北洋政府颁布的《壬戌学制》,将“体操科”改为“体育科”,武术随着田径、体操、球类、游戏等项目进入学校体育课程之中。武术的体育学科属性得到了进一步强化,其在体育方面的价值也日益凸显。

1920—1930年,中国武术理论尽管受到精英群体的关注,在中西体育争辩中螺旋发展,但相较于西方体育及其理论在中国的快速传播,其整体上显得缓慢而滞后。这一时期,与西方体育理论、体育思想、体育著作大量引入的繁盛景象相比,中国武术理论文章和学术著作则相对较少。据《民国时期总书目(1911—1949):教育·体育卷》记载,这一时期商务印书馆共推出体育类书籍131种,其中西方体育类著作约占80%,而包括武术在内的民族形式体育类书籍只有27种,约占20%。尽管一些武术家和学者积极关注中国武术的发展,为中国武术理论的建设提出了开拓性的理论建言,但真正推动中国武术广泛开展并引发关注的却是社会精英及政治精英群体,如严复、梁启超、谭嗣同、孙中山、张之洞、马良等。作为社会精英或政治精英,他们对武术的关注仅停留在了话语层面。而以当时的条件,难以展开系统而周密的武术理论建设工作。加之近代中国面临着民族和文化的双重危机,精英群体对中国武术的促进常与政事相关联,其理论演进也常因政权交替而变更方向。如“中华新武术”就是在新旧体育之争的辩论声中夭折的^[8]。

整体而言,近代百年的中国武术理论发展史,在中华文明的历史长河中不过是沧海一粟,但这一百年,却引发了中国武术演变进程中最深刻的理论变革。中西文明激烈碰撞背景下,西方体育概念的引入,对中国武术传统的存在形式和理论意涵形成了巨大冲击,虽然许多武术家、文化学者做了多方面的努力,但“以西为镜、以体为鉴”的理论探索仍然是近代中国武术理论发展的整体趋势。在文化思想的冲突与争辩下,关于武术的“古今之辩”“中西之争”不绝于耳,这一时期也成了近代中国武术理论众语喧哗的活跃期。

1.2 “改旧立新、重估创编”的中国武术理论奠基经验

伴随着新中国的诞生,体育事业迎来了发展的春天。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武术的发展与研究工作,在“接管、改造旧体育与建设新体育”^[9]工作方针指导下,学者们就武术如何融入新中国体育事业等问题展开讨论。1950年,李仲弢在《新体育》发表的《谈国术的改造》中提出:“国术是中国民族旧有的体育,是目前新民主主义国民体育,增进人民体能的一个很重要的形式。”^[10]1954年,“中央体育民族形式体育研究会”发表《为什么不叫武术为国术》一文指出:“今天提倡武术的目的,是把它作为一种练习身体的运动项目,并列为我们民族形式体育的主要组成部分,在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育,为国防建设与生产建设服务的总目标下发挥它的积极作用。”^[11]新中国成立之初,武术作为体育事业的主要组成部分,面临着目标定位的转型和形式称谓的改进,其理论建设主要以新民主主义体育方针为指导,围绕着“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核心思想展开。

1949年10月,全国体育工作者代表大会上,冯文彬提出新民主主义体育特征应当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在此思想指导下,中国武术理论建设围绕着“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方向展开。1950年8月1日,《新体育》第二期刊登了张文广的《介绍两种民间体育游戏——石锁与沙袋》,第五期又刊登了其《介绍摔跤》一文^[12],第六期刊登了李剑华的《介绍八段锦》^[13],这些文章从“大众的”需求出发,介绍了不同形式的锻炼方法与健康价值。唐豪《我国武术与武舞的起源》^[14]、项淳一《谈太极拳的源流问题和研究武术史的方法》^[15]等历史探源的文章则凸显了“民族的”中国武术。而“科学的”中国武术理论探索,则主要体现在对解剖学和生理学的运用上,如温敬铭在《从蓝素贞的“绵拳”谈对整理研究武术的看法》一文中写道:“以蓝同志的较弱的身体,练习长达四分钟的拳路,是面不更容,目不改色,当然他的功夫是一件事,但是,拳术中没有力量乃是主要的。不妨请她练习一次,作一次生理测验,看看她的脉搏增加多少,就可以加以证明了。”^[16]杨峰《把武术和基本功用短跑训练中来》^[17]一文,运用了科学实验法展开论证。还有部分科研人员,“采

用运动医学手段对太极拳和其他拳种的运动员进行了多项生理指标的测试”^[18]。到20世纪50年代末,中国武术研究已经开始注重科学实验,运用生理指标检验和解释武术训练的效果。

1957年,受“大鸣大放”体育思想^[19]的影响,《体育文丛》编辑部组织了“关于武术学术问题的座谈会”,重点讨论“关于中国武术的性质、价值、技术特征;技击、舞蹈、体育三者的关系;统一武术教材和百花齐放”等问题。代表性观点有:武术是融合了技击与舞蹈的健身方式(温敬铭);武术是技击、舞蹈、体育的综合(蔡龙云);武术艺术丰富、特点突出,应注重特色(郑怀贤);武术的击和舞能促进健康,是民族形式体育,属于教育(刘世明);击、舞是武术两翼(王子章);武术是技击、舞、体育三者的结合(郝家俊)等^[20]。会上还呈现了代表性文章,如《我对武术的看法》(蔡龙云),《武术是锻炼身体的方法》(吴高明)等。虽然这场座谈会并未能对一些本体性概念给出统一的学术定论,也未达到理论构建的深度和广度,但它促进了学者们对武术本质、特点、属性等方面的讨论与反思。并且,在此之后许多重要的武术套路得到了整理和创编,如24式简化太极拳、刀、枪、棍、剑等,就此而言,其对中国武术理论的建设仍具有奠基意义。正当中国武术理论研究即将步入新的起点时,“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使这一进程停滞了下来。总体而言,1949—1979年,中国武术理论话语在改造与重估下进入了奠定期。尤其是在武术训练理论方面,形成了一些代表性的理论,如蔡龙云的《武术运动基本训练》(1963),总结了武术技法,提出“四击八法十二型”之说,成为中国武术的经典理论。

1.3 “总结反思、主体回归”的中国武术理论自觉经验

20世纪80年代,武术学者们开始了总结以往经验、反思现实问题、重启理论研究,一系列的恢复建设工作有组织地展开。如1982年,第一次全国武术工作会议召开;1986年,国家体委武术研究院成立;1987年,中国体育科学学会武术分会成立等。中国武术理论研究工作得以重启,在相关学术组织的带领下,研究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值得强调的是,在1983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公布的《学科专业目录》中,体育被列为一级学科,归属教育学门类,武术理

论与方法被列为二级学科,标志着武术真正作为一门学科得以形成。这种“分科治学”的方式,极大促进了武术学科的发展。随着武术学科建设的持续推进,一大批武术科研骨干也随之产生,他们的科研探索促进了武术学科理论的快速繁荣。20世纪90年代,大量科研成果开始呈现,代表性学者如周伟良、温力、江百龙、李成银等,他们在关于中国武术理论建构的文章中提出建构武术学科和武术学科理论体系的主张。虽然后续有学者也进行过相关研究,但并没有引起学界的普遍重视,也未形成系统性理论探索。1996年以后,随着武术博士点的获批,武术理论研究开启了加速模式。当然,这一时期的武术理论研究拓展为民族传统体育学学科理论研究,涌现出丰富的学术成果,并形成了一股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研究热潮,代表性学者如赵苏喆、倪依克、白晋湘等。但自此,从独立学科意识讨论中国武术理论建构的学术研究开始减少。

进入21世纪,随着改革开放的持续深化,国外各种学术理念被广泛引入,学术全球化成为新态势。在此背景下,“中国思想文化领域掀起了一股译介和学习西学,研究、反思以及批判传统文化的浪潮”^[21],中国武术理论研究也迎来了观念创新、自我反思、范式变革的新机遇。尤其是中国武术研究的“文化热”,促进了学者们的思想解放和学术创新。当然这股“文化研究热”的背后是“西学热”,权威数据显示,改革开放后的30年间,西方社会科学对中国学术的影响一度占据主导地位^[22],甚至可以说人文社科所取得的学术成就,既非对传统的承袭,亦非对当代的立足,而是对西方学术经典的转译、研习与传授^[23]的结果。在这种双重“热潮”成长起来的武术学者,也表现出急切拥抱西方理论,实现中国武术“现代化”发展的“渴望”。如戴国斌教授谈自己的武术研究之路时,对鲍曼、福柯、布迪厄等西方学者的思想记忆深刻^[24]。改革开放后,西方文论的大量引入,打破了此前单一的苏联体育理论模式参照,无论理论观念还是方法论观念,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尤其是伴随着全学科理论著作的译介,中国武术研究有了更广泛的思想借鉴、更多样性理论阐释。学者们的理论视野也跨越民族界限和国家界限,形成了全球化意识,助推了学术研究的国际化。

然而,对西学的借鉴和吸收,并不意味着可以滥

用西方理论,更不能一味求新而舍弃自身的主体性。必须明确的是,尚处于现代化起步阶段的中国社会,现代性问题可能尚未显露,那么其后现代问题也就更无从谈起,对于理性、非理性主义缺少深刻理解和清晰的把握,更多是介绍或是套用^[25]。这也是为何现在回看当时以西方理论解释中国武术的研究成果时,会出现那么多理论与实践不契合的问题。学者们反思武术研究的成就、经验与不足,感慨其始终未能实现“国内的大繁荣、国际的大发展”^[26],并反思照搬西方理论的研究现象,“以体释武”“强制阐释”等都忽略了中国武术的“主体性”^[27]。正是基于这些总结和反思,中国武术研究逐渐进入了文化自觉和理论自觉期,探求本土化、自主性、本真性的理论话语逐渐成为新趋势,尤其是一些青年学者开始从中国哲学、美学、民族学等视角研究中国武术。

2 深化主体性“基础理论”:构建中国武术自主理论话语体系的立论基石

中国武术的基础理论主要包含基本概念、理论范畴、技术范畴以及相关原理等。哲学社会科学具有多学科属性,各学科间有着不尽相同的性质、对象、方法。对此,贺来^[28]指出,作为“基础理论”,哲学社会科学的各学科间分享着一些共同的性质,这些性质区分了其他学科研究方式,形成独特的学术品格。因此,只有厘清中国武术基础理论的主体性特质,才能在其话语体系建构过程中与其他学科区分开来,才能形成中国武术作为独立学科的学术品格。那么,深化中国武术学科的主体性“基础理论”,首先应从追问、澄清、反思学科的合法性出发,重点聚焦其理论基石。透过中国武术理论的学术发展史可以看到,每逢其面临重大突破之际,学者们总会追问和反省“何为武术?”并对已有的基本概念、本质属性、核心价值等进行反思和讨论。如20世纪50年代“关于武术学术问题的座谈会”上,中国武术学界集中讨论了武术的性质问题,理清了中国武术与体育、舞蹈之间的关系,确立了其体育化发展的方向。改革开放后,学界又展开了一轮关于武术概念、本质、定义等问题的学术探讨。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学界对中国武术概念的探讨,总会伴随着哲学社会科学的重大变化,而展开理论批判、主体追问、价值反思等。从这一规律来看,学界应展开一场关于中国

武术概念、本质、范畴、价值等基础理论的再讨论和再反思,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的理论成就与理论经验,形成中国武术理论研究的新方向、新范式。

其次,还应从“致力于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前提性的批判反思与深度探索的特质”出发,找到中国武术学科发展中积淀形成的“核心问题”。将这些核心问题与当下社会的需求相对接,不断地进行主体性阐发,最终概括、提炼和总结为中国武术面向中国式现代化发展中的重大理论问题。这些问题一定要反映出中国武术理论的独特性,因为中国武术诞生在中华文明独特的社会文化土壤中,生发了中国武术独特的理论体系,从中透射出中华民族特有的人文精神。就此维度而言,研究中国武术就是在研究中国社会的变革,就是在研究中国文化的变迁,就是在研究中国人民的变化,武术研究范围虽小,但意义重大。所以,在研究中国武术理论“核心问题”时,需要深挖中国武术历史文化的独特性,以时代发展的全局观进行主体性审视和解释。

最后,从“吸收、总结和升华学术发展史上的重大思想成果,积淀深厚的学术传统,创造性地生成和转换学科的概念、范畴和理论体系”出发,提炼武术的核心概念与核心概念群。系统总结和梳理中国武术的学术史,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理论研究,找到重要时期“学术转型”和“典范转移”过程中的“新解释”和“新发现”。实现在学术积累中养成学术传统,在学术传统中总结提炼中国武术理论最核心的概念。核心概念的提出是建立主体性理论的基础。黑格尔在《小逻辑》中写道:“概念就是存在与本质的真理”^[29],是理论话语建构的基石,具有不可替代性,尤其是核心概念。中国武术的核心概念,在西方体育引入之后发生了许多维度的变革,其中一部分成为理解武术的起点,而另一部分则成为掩盖武术主体的遮蔽。这使得中国武术历史发展中沉淀的一些概念和术语,在其现代化进程中被体育范畴的概念所替代和掩盖。在理论传播中,概念是理论话语与日常话语的连接点,是沟通、理论、认识的桥梁,任何一个理论都始于概念,或者说理论本身就是一种基于概念群而建立的解释系统。因此,当下建构自主性中国武术理论话语体系,应该提炼和创造出中国武术理论的核心概念及其概念群,为实现理论话语体系的主体性解释和传播提供“立足点”。

3 加快创新性“范式转换”:构建中国武术自主理论话语体系的内生动力

依据“范式”理论,学科发展类似一种范式转换的过程,这种转换是对元理论的一种深刻变革。回顾中国武术理论的发展历程可发现,特定历史阶段对于古今、中西等问题的求解,无不形成了其所在时代的总体性特征,即一种“范式”特征。如兵操、中华新武术、武术整编、武术入奥等,每个时代都形成了具有各自“范式”的理论成果,为解决时代之问和时代之需,集中了理论智慧与理论力量。然而,这种“范式”一旦形成也极易引起思维定式,对理论创新来说具有一种“结构性”的阻力。因此,每当新的理论“范式”形成之时,也就意味着新一轮“范式转换”需求的开始。加快创新性“范式转换”成为构建中国武术自主理论话语体系的一种内生动力。

当然,创新性“范式转换”应首先着眼于解决中国武术理论中的核心问题,应服务于中国特色武术学科体系的建构。创新与转换的前提是立足“中国大地”,着力“中国特色”,凸显“中国话语”,从历史观、价值观的高度,对困惑中国武术现代化发展过程中的古今、中西问题,从“文化自信、理论自信”的立场,跳出原有“范式”,展开新一轮的论证和求解。在具体的学术实践意义上,加快探寻中国武术理论发展的新转向,即“以现代化(西方化)为纲向以中国化为纲”^[30]的话语体系转变的理论方法。应深刻认识到武术理论未来发展方向,建立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武术理论体系,结合丰富的武术文化实践,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方法,实现对元理论、元方法、元问题等固有“范式”的创新性转换。如学者对武术身法的学理要义^[31]探寻,让身法这一长期以来居于武术技术核心的概念,更具理论性。再如,综合身体社会学理论和性别社会学理论,对新媒体时代武术在网络世界中女性展演的研究,解释了中国武术女性习练者的“飒”^[32]形象建构过程,凸显了“中国气派和风格”的女性武术美等。

“认识一个民族、一个文明的特性,才能更好地推进这个民族现代文明的发展。而要把握文明、民族的特性,就要有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33]习近平指出的中华文明的5个突出特性,深刻揭示了中华文明的基本特征和内在逻辑,也为新时代武术理论“范式”创新提供了重要遵循。党的基本经验告

诉我们,创新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将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武术文化创新中的理论启示价值。深入挖掘中华文明基因、文化精神与马克思主义的契合性。通过深入研究中国武术的历史发展和文化内涵,深刻揭示其与马克思主义的内在联系和共同价值,为中国武术理论“范式转换”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保障。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中国武术,其理论“范式转换”既要借鉴吸收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又要展现有别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新图景,唯此才能在多元世界文化版图中大放异彩。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成果证明,构建中国武术自主理论话语体系须善于运用党的创新理论,立足中华文明丰厚底蕴和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实践,整理好中国材料,总结好中国经验,讲述好中国道理^[34]。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结合新时代的发展要求和实践需求,不断加快创新性武术理论“范式转换”,推动武术理论研究的持续深入。转换中国武术理论“范式”,不仅是对武术研究的进一步深化和拓展,更是对中华文明传承与创新的重大理论贡献。唯有通过加快“范式转换”推动理论创新,中国武术才能更好地展示中华文明的风采和魅力,才能在弘扬优秀文化、助力民族复兴的征程上,增添中国武术的智慧和贡献。概言之,加快创新性“范式转换”是实现中国武术理论不断创新继承、创造发展的“自我革命式”内驱力,需要武术研究者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不断探索实践、不断借鉴吸收、不断革故鼎新、不断应时而变、不断融合发展。唯此,才能形成构建中国武术自主理论话语体系的强大内生力。

4 恪守人民性“中国立场”:构建中国武术自主理论话语体系的根本遵循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指出:“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党的理论是来自人民、为了人民、造福人民的理论,人民的创造性实践是理论创新的不竭源泉。”^[35]因此,构建中国武术自主理论话语体系的根本遵循在于恪守人民性的“中国立场”。武术归属体育学,“是人学的一部分”^[36],武术理论中蕴含的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等和谐思想,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等伦理观念,身心一体、身国一体、以身

为美^[37]等具身道德^[38]……无不凸显了武术作为人学的人民性。武术回归人民,即回到了中国文化思想的本质,唯有如此,才能从丰厚的中国文化传统中获得源源不断的理论滋养。但是鸦片战争之后,西方中心主义对中华民族全面的影响,使其不得不借助西方理论话语实现对自身理论的现代化转型,长期的学习借鉴使我们养成了一种眺望他者的习惯,而面对自身的伟大历史和巨大思想遗产,却往往采取背对姿态^[39],而难以发现和转化为有效的话语资源。这使得武术理论从注重身心合一走向强调身心二分,从注重培育“整全发展的人”趋向培养“单向度的人”。一百多年的中国武术理论发展,一直是以西方文论为模板,话语体系上不断地让位于舶来的域外文化,其承载的人民性文化精神也处于被挤压、被弱化的状态。“不忘历史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善于创新。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如果丢掉了,就割断了精神命脉。”^[40]在此精神指引下,要以不忘本来的文化自信力,将理论根基深植于中华文化沃土之中,对接中国人民的时代之需,实现武术理论的中国式现代化转型。唯此,人民性的中国武术理论之树才能根深叶茂。

西方体育理论通过特有的理论话语加以表达,曾一度强力主导了中国武术的理论发展,表现出“西强我弱”的文化态势,人民性话语渐渐被标准化、数据化的评价指标体系所掩盖。习近平高度重视新时代中国话语体系建设,围绕着中国话语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怎么建等重点论述^[41]。应思考和探究中国武术理论话语建构的根本性问题,并基于此问题建构中国武术自主性理论话语,才能大胆地跳出以往西方体育话语的中心,才能坚定中国民族文化立场,凸显武术理论的人民性,并保持中国武术思想的原创性。就文化的世界走向而言,保持民族性和多样性才能凸显人民性。尽管文化全球化成为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西方文化的霸权企图和野心,但中国人民对文化民族性和多样性的坚守和捍卫却一刻也没有停止过。从马克思主义对于文化世界性和民族性发展趋势的经典论述中可以感知其对单极的全球化霸权文化生成之否定、对文化多样性和民族性之强调。反对文化霸权主义,倡导多样文化间的平等、交流与互鉴,主

张文化世界性与民族性的辩证统一,正是对人民性的肯定和高扬。世界文化因民族性而繁盛,民族文化因世界性而彰显,民族文化的样式越独特、历史越悠久、结构越宏大,其文化生命力越强大,也就更容易走向世界,更能体现其民族文化的世界性^[42]。毛泽东曾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著名方针,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中央领导人,分别提出了建设两个文明、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等论述,这些论述都为中国武术理论建设提供了方向指引,保障了中国武术理论的人民性立场。

中国武术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深厚的历史积淀和独特的文化内涵,这种深厚的历史积淀赋予了我们坚定的文化自信,这是建设武术自主理论话语体系的文化源泉。只有了解和尊重中国武术的历史发展脉络,继承和发扬前人积累的经验 and 智慧,才能确保理论体系的构建既有深厚的历史根基,又能与时俱进。理论研究还要与人民实践相结合,在适应和满足人民的需求下,突出武术研究的实用性和普适性,不断丰富和完善武术理论话语体系。总之,在构建中国武术自主理论话语体系的过程中,必须坚守人民性这一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必须立足于中国式现代化发展之需求,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从人民的创造性武术实践中提炼出造福人民的武术新理论,深刻揭示理论话语体系建构中面临的主要矛盾,回答好体系建构中的结构性问题,以民族的、世界的、现代化的眼光聚焦“中国立场”的武术理论之发展。只有恪守人民性“中国立场”,才能充分彰显中华文化的民族性,也才能在世界文化中凸显中华民族的文化身份和文明标识。这一立场是建设理论话语体系的底线,也是在世界文化激荡中获得话语认同的基本立场,更是彰显话语自主性、保持话语独立性的根本原则。

5 拓展开放性“国际视野”:构建中国武术自主理论话语体系的活力源泉

一百多年前,西方现代体育初入中国,学界就引发了新旧体育之争、中西体育之争,体现出难能可贵的开放精神。20世纪初的西方体育引进,20世纪80年代的西方理论借鉴,都反映了武术学界对外来知识、理论的兴趣,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本土理

论创新的不足。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武术学”和“武术理论体系”的学术构想提出以来,学界并没有以此为核心继续推进,学科独立性的理论设想几乎被忽略了^[43]。这也致使中国武术自主理论话语体系并未真正建立起来,更无法形成与西方体育理论等量齐观的学术对话。但不可否认的是,经过几代武术学人的不懈努力,武术理论已经立足,并结出了丰硕成果。中国武术理论的演进过程中学习并吸收西方文化的先进经验和优秀思想,成为中国武术学者的共识。尤其是中国改革开放政策实施以后,西方文论的大量引入,加速了中国武术理论的繁荣发展。纵观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向西方国家学习的态度,实质上是探索自身理论发展的一种必要方式。而反观中国武术理论的学术研究,自新文化运动以来,困扰其发展的古今、中西问题至今仍然存在。

学科的独立性在于独立的理论体系、知识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而这些体系要实现有效的交流、传播、传承、创新等,首在话语体系的构建。反映客观事物本质的话语,既是思想主张的概括,也是学说、学派得以确立的身份标识^[44]。话语表达是意义传递、知识学习、信息接受与理解的前提,具有引导、规范、启发等方面的作用。由此而言,中国武术在学科理论上应该形成独立的话语表达方式。自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武术理论对西方理论思想的借鉴和吸收的经验启示,也反映出一种通过“他者”认识“自我”的话语演进过程。话语表达的独立性,是在“自我”话语与“他者”话语对话中形成的。因此,创建具有“国际视野”的中国武术自主性理论话语体系,是“吸收外来”的“他者”话语与“不忘本来”的“自我”话语辩证统一的过程。“不忘本来”并不意味着中国武术理论发展是对西方体育研究成果的拒斥,更不是要构建一个封闭、自我循环的解释系统,而是在“不忘本来”的基础上,以开放、包容、自信的心态,勇敢地面向和拥抱文化全球化,积极地“吸收外来”,为中国武术理论建设汲取更多有益的文化滋养。无论是近代模仿日本“军国民教育思想”来重新审视中国武术的军事价值,还是按照欧美“自然主义体育思想”来重构中国武术的教育价值,抑或借用社会学、人类学、传播学、伦理学等西方理论对中国武术进行阐释、解读,都离不开学者们吸收借鉴“他者”的世界眼光。

虽然在“吸收外来”的过程中,武术研究对西方理论应用的种种实践也存在一些水土不服的现象,但总体而言,西方文论对中国武术理论建设是大有裨益的。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多元理论的引入使武术研究的理论视域、学术观点、研究方法等都发生了显著变化。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理论传统、内容方法、研究范式、产生机制等,都对武术理论在研究内容、方法、范式等方面的创新,发挥了重要的启示作用,创新了中国武术理论。除了理论引入和借鉴之外,我们还应加强中国武术理论的外译工作,当前武术典籍外译的匮乏^[45],影响着武术的对外传播,阻滞了作为理论话语的中西交流和互鉴。因此,当代武术研究者要立足“四个自信”“不忘本来”,积极地“吸收外来”,将中国武术的学科建设、理论研究、学术方向等“面向未来”,与“文化强国、体育强国、教育强国、健康中国”等国家战略紧密结合,凝聚成重大学术问题、积淀学术成果、塑造学术流派,以拓展开放性“国际视野”,赢得国内外学者的认同和尊重。

6 结语

就中国武术自主理论话语体系的构建、完善和发展而言,是需要潜心钻研、不断求证、不断实践的基础性工程。如肃清历史、辨析术语、确立核心概念与基础理论等具体研究工作,都需要持之以恒、久久为功。面向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征程,中国武术理论研究者更应保持强烈的学科意识,紧紧围绕国家战略的重大需求,深度阐发其内隐的哲理、精神、意义和价值,全面建设其自主理论话语体系。同时,还应确立中国武术与西方体育文化、奥林匹克运动“同中有异”的基本立场,既要重视中国武术走向世界的发展道路,更应强调中国武术凸显民族性和属于人民性的本质特性。以坚定的中国立场和开放的国际视野,努力构建具有显著“本土性”“原创性”“标识性”的中国武术自主理论话语体系。唯有在立足本土、保持自主、坚定自信的基础上,坚持以古自镜、以优为鉴、开放包容、开拓创新,勇于跳出以往或“唯竞技”或“唯传统”的单一化认知窠臼,深度探索武术的本体真实,才能构建起一种不失民族传统、融“古今”“中西”为一体的中国武术自主理论话语体系。

参考文献:

- [1] 尤传豹,高亮.加快构建中国特色运动训练理论体系[J].体育学研究,2024,38(2):2.
- [2] 马文友.从传统走向现代:中国武术审美文化转型、成因及当代启示[J].体育学研究,2023,37(5):11-19.
- [3] 任剑涛.“中西之争”的全球史呈像[J].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5):49-68.
- [4] 王岗,陈保磊,丁昊阳.对中国武术学科“三大体系”建构的理论之思[J].体育科学,2022,42(10):28-34.
- [5] 俞祖华,怀培安.优生·强身·尚武:近代身体史视阈下的民族复兴思想[J].人文杂志,2020(8):59-70.
- [6] 邱丕相.中国武术教程(上)[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2013.
- [7] 郎净.近代体育在上海(1840—1937)[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
- [8] 国家体委武术研究院.中国武术史[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97.
- [9] 傅砚农.中国体育通史(第五卷)[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2008.
- [10] 李仲弢.谈国术的改造[J].新体育,1950(2):15.
- [11] 中央体育民族形式体育研究会.为什么不叫武术为国术[J].新体育,1954(44):36.
- [12] 张文广.介绍摔跤[J].新体育,1950(5):23.
- [13] 李剑华.介绍八段锦的一种[J].新体育,1950(6):23.
- [14] 唐豪.我国武术与武舞的起源[J].体育文丛,1957(3):37.
- [15] 项淳一.谈太极拳的源流问题和研究武术史的方法[J].体育文丛,1957(3):18.
- [16] 温敬铭.从蓝素贞的“绵拳”谈对整理研究武术的看法[J].体育文丛,1957(12):20.
- [17] 杨峰.把武术和基本功用到短跑训练中来[J].体育文丛,1959(1):31.
- [18] 邱丕相.中国武术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
- [19] 何叙.中国近现代体育思想的传承与演变[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2013.
- [20] 座谈会纪录.关于武术性质问题的讨论[J].体育文丛,1957(5):21-24.
- [21] 欧阳雪梅.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史[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16.
- [22] 苏力,陈春声.中国人文社会科学三十年[M].北京:三联书店,2009.
- [23] 郭震旦.音调难定的本土化——近年来若干相关问题述评[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34(1):1-18,194.
- [24] 戴国斌.书评:鲍曼《现代性与大屠杀》的理性与道德之思[EB/OL].[2021-08-24].<https://mp.weixin.qq.com/s/ILwq6bHrbWaJmdnM4RUVqw>.
- [25] 欧阳雪梅.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史[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16.
- [26] 邱丕相.“武术研究”专栏导读——进入新纪元的中国武术研究[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13,36(9):1-3.
- [27] 王岗.消隐与回归:中国武术发展的批判与反思[M].北京:北京体育大学,2017.

- [28] 贺来. 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基础理论”[N].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21-10-12(8).
- [29] 黑格尔. 小逻辑[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0.
- [30] 王学典. 学术上的巨大转型: 人文社会科学40年回顾[N]. 中华读书报, 2019-01-02(05).
- [31] 金玉柱. 中国武术“身法”的学理要义与实践智慧[J]. 上海体育大学学报, 2024, 48(9): 78-87.
- [32] 陈保学, 叶浩浩, 金玉柱, 等. 青年女性武术“网红”“飒”形象建构: 身体展演、媒介生成与自我规范[J]. 体育与科学, 2024, 45(3): 95-102.
- [33] 辛向阳. 中华文明五大突出特性的马克思主义之维[J]. 东南学术, 2024(6): 1-9, 245.
- [34] 孙庆伟. 构建中国考古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四个支点[J]. 红旗文稿, 2024(15): 37-40, 1.
- [35]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N]. 人民日报, 2022-10-26(001).
- [36] 程志理. 论“体育属于人民”——党的二十大报告基本理念与中国式体育现代化[J]. 西安体育学院学报, 2022, 39(6): 513-517, 560.
- [37] 陈保学, 胡昌领. 中国武术“以身为美”的理论建构与解构[J]. 体育学研究, 2020, 34(2): 87-94.
- [38] 麻晨俊, 高亮. 具身武德: 学校体育弘扬中华武德的理论选择与实践要求[J]. 体育学研究, 2023, 37(3): 87-94.
- [39] 曹文轩. 不忘本来 吸收外来 面对未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N]. 文艺报, 2016-12-03(3).
- [40] 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 2014-09-25(02).
- [41] 何毅亭.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中国话语建构[N]. 学习时报, 2020-10-28(1).
- [42] 韩子勇, 祝东力, 李修建, 等. 关于中国艺术学“三大体系”建设的若干问题[J]. 文艺研究, 2019(12): 5-17.
- [43] 陈保磊, 马世坤, 袁金宝. 新文科建设背景下中国武术学科发展研究: 回眸、构想与策略[J]. 武汉体育学院学报, 2024, 58(2): 81-88.
- [44] 徐勇, 任路. 构建中国特色政治学: 学科、学术与话语——以政治学恢复重建历程为例[J]. 中国社会科学, 2021(2): 165-182, 207-208.
- [45] 孙刚, 殷优娜, 李杉杉. 格式塔理论视角下中华武术典籍中的文化意象英译研究[J]. 体育学研究, 2023, 37(4): 55-66.

作者贡献声明:

陈保学: 提出研究选题, 修订研究方案, 撰写论文, 修改和校对论文; 陈保磊: 讨论研究选题, 设计研究方案, 收集资料, 撰写和修改论文。

Basic Dimensions of Independent Theoretical Discourse System for Wushu

CHEN Baoxue^{1,2}, CHEN Baolei³

(1. School of Humanities,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Xi'an 710049, China; 2. Zhongnanshan Wushu Research Center, Xidian University, Xi'an 710071, China; 3. Departm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 and Military, China Jil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18, China)

Abstract: The evolution of Chinese Wushu theory has been deeply influenced by Western sports studies since the New Culture Movement. After more than a century of development, the discourse paradigm of Chinese Wushu theory based on Western sports theory has finally been formed, while the independent theoretical discourse system of Chinese Wushu has not yet been formed. In the great journey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that how to construct the independent theoretical discourse system of Chinese Wushu has become an urgent topic of the times. To answer the questions of the era and achieve this academic ideal, it is necessary to have the basic experience of adhering to the critical “self-examination of the past”, deepening the foundation of the original “basic theory”, accelerating the endogenous driving force of innovative “paradigm shift”, adhering to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 of the people-oriented “Chinese stance”, and expanding the vitality of the ope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Contemporary Chinese Wushu scholars should deeply grasp the development opportunities of the new era, have a forward-looking vision and confidence in the development of discipline theory, boldly break out of fixed thinking, and make efforts in continuous 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reference and absorption, innovation and integration, and strengthen the independent theoretical discourse system. Only in this way ca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independent theoretical discourse system of Chinese Wushu continuously radiate new vitality and truly become a discourse reference with strong “Chinese attributes”.

Key words: Wushu; sports theory; people's character; Wushu theory system; cultural confidence